

明清八股与史传

何诗海

内容提要 明代中期以后，随着“以古文为时文”蔚为风气和叙事文在古文谱系中地位骤升，八股与史传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八股文体的特殊性，决定了根抵经史的迫切性和以史解经的必然性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外，明清作家特别强调研读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籍，借鉴史传在章法结构、散体表达、虚构艺术和风格塑造等方面的杰出成就，为这种日趋陈腐、空疏的文体注入充实的内容和蓬勃的生机。史传因此越来越多地进入文章选集和评点家视野，日益辞章化和文学经典化。

关键词 古文；时文；八股；史传；经典化

明清时期，文章学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，即以写人纪事为主的史传文，纷纷涌入文章选集，打破了《文选》以来总集不录史传的编纂传统。如吴讷《文章辨体》、唐顺之《文编》、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、徐乾学等《古文渊鉴》、蔡世远《古文雅正》、曾国藩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等，都大量选录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、“前四史”乃至《新五代史》等史著中的纪传文。不仅如此，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专选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选本以及相关评点著作，如储欣《史记选》、高塘《史汉合钞》、王源《左传评》、葛锡璠《汉书汇评》等。这些现象表明，史传文已成为明清文章学的关注热点。笔者曾撰专文，从四部藩篱之突破、辨体批评之需、叙事文地位之提高、研习八股之需四方面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^[1]。其中“研习八股”部分，与本论题相关，惜限于篇幅，未能敷畅其旨。本文拟就明清八股写作与史传的关系，作进一步探讨。

一 “以古文为时文”中的史传文^[2]

作为一种创作方法，“以古文为时文”并非始于明人。南宋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、楼昉《文章规范》等古文选本，都为指导科举时文写作而编，自然蕴含着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萌芽，但并未形成理论自觉；其所谓“时文”，主要指经义、策论等，不同于明清主要指八股。又，宋人热衷议论，擅长

议论，其文章学理论，较少关注叙事，故两宋古文选本，除《文章正宗》外，基本未选史传文。换言之，时文与史传，并未发生直接关联。这种状况，一直到明代中期，才发生显著变化。八股发展至成化、弘治时期，体制已高度成熟，逐渐走向僵化、板滞。正德、嘉靖以后，唐顺之、王慎中、茅坤、归有光等古文大家崛起于文坛，明确将古文之格调、境界、技法等引入八股创作，为日趋陈腐、僵化的八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，也迎来了明代八股的鼎盛，正如方苞所论：“至正、嘉作者，始能以古文为时文，融液经史，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，为明文之极盛。”^[3]此后，“以古文为时文”逐渐蔚为声势浩大的潮流，甚至超越门户局限，成为不同立场、不同流派作家的共同追求。除唐宋派外，七子派的王世贞、公安派的袁中道、江西派的艾南英、云间派的陈子龙，尽管在师心与师古、取法秦汉与取法唐宋等问题上，曾势如水火，但都对“以古文为时文”表示赞赏并付诸实践。入清之后，储欣、韩荃、李光地、方舟、方苞等时文家，奉正、嘉作者为典范，继续高倡“以古文为时文”，推动了清代八股的进一步繁荣。时人激赏贺贻孙、徐世溥制义“原原本本，出之经史，真能以古文为时文者”^[4]。戴名世甚至宣称，“顷者，余与武曹执‘以古文为时文’之说，正告天下”^[5]，俨然奉为不二法门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奉上谕：“有明决科之文，流派不皆纯正，但如归有光、黄淳耀数

人，皆能以古文为时文，至今具可师法。”^[6]以天子之尊躬亲倡导，可见“以古文为时文”已成官方和主流所推崇的创作理念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明代中期兴起，一直延续到清代的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思潮，始终与史学、史著，尤其是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代表的史传息息相关。因为，在明清古文家心目中，文章众体，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为叙事，二为议论。其中“叙事之文，尤为重大”^[7]，不论圣君之治、圣贤之教，还是忠臣义士、贤能贞烈，无不借叙事传世生辉，否则只会湮没无闻。而叙事文又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为最高典范，故“古文必推叙事，叙事实出史学”^[8]，“自韩愈以降，凡以古文名者，莫不兼治史”^[9]。周永年《先正读书诀》载童蒙习举业，前十年必读书目为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太极通书》《西铭》《纲目》和古文。其中“古文”条列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、八大家文五目，可见史传在古文中地位显赫。随着“以古文为时文”蔚然成风，研读史书、揣摩史传必然在八股写作中起着重要作用。

以这一观念最早的倡导和实践者唐宋派作家为例。唐顺之博贯经史百家，著有《左氏始末》十二卷、《史纂左编》一百二十四卷，于史学多深造自得。在文学观念上，他推崇三代、两汉文学传统，同时也肯定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，认为善学秦汉者，莫过唐宋八大家，故学文当由唐宋入，以八家为梯航而上溯秦汉，由浅入深，庶可免七子歧途。而秦汉文中，史传文为荦荦大端，故其选辑《文编》，既选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传文，又大量录唐宋文。在八股史上，唐顺之是明确引古文之法入时文写作的早期代表作家，方苞有“以古文为时文，自唐荆川始”^[10]之论。其八股以熟稔史事、妙运机法、得史家笔意而卓然自立。茅坤编纂《八大家文钞》以资举业。在他看来，八家文各自成家，而皆不悖六经之旨，不离史迁法则，其中最具史才、最善学《史记》者莫如欧阳修。欧氏记述国家大事和历史人物，“往往点次如画，风神粲然”，“独得太史公之遗”^[11]。故《八大家文钞》录其文，既有《庐陵文钞》三十二卷，复有《庐陵史钞》二十卷，后者选文皆来自《新五代史》

之本纪、列传。茅坤本人的八股，“得《史》《汉》、欧、曾之遗法，虽寥寥短幅，自有超迈之气”^[12]，与史传渊源深厚。又，有“明文第一”之誉的归有光，为文师法司马迁和欧阳修，于太史公书用力尤深，曾评点《史记》，“若者为全篇结构，若者为逐段精彩，若者为意度波澜，若者为精神气魄，以例分类，便于拳服揣摩，号为古文秘传，前辈言古文者，所珍重授受，而不轻以示人者也”^[13]。由于归氏以古文大家兼时文巨擘，是明代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最有代表性的作家，故其《史记》评点不仅是古文圭臬，也是明清举子朝夕揣摩的科场利器。又，艾南英论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曰：

制举业之道，与古文常相表里。故学者之患，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。不能以古文为时文，非庸腐者害之也，好夸大而剽猎浮华以为古，其弊亦归于庸腐。古文自周秦而后，莫如太史公迁^[14]。

艾南英为明末时文大家，因不满科场文体之庸腐，与章世纯、罗万藻、陈际泰一起致力于八股改革，有“江右四家”之誉。改革策略，与唐宋派一样，倡导“以古文为时文”而奉《史记》为典范。在艾氏看来，“昔人摹仿史迁叙事，但能见之古文词耳，今乃见之时文，此开辟来文章一变局也”^[15]，为这种日趋陈腐的文体开拓了生存机遇和发展空间，是八股史上的一大转关。史传经典在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思潮中的意义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。王汝骧高倡八股写作当“得左、马之笔，发孔、孟之理”，认为“有明制义，实直接《史》《汉》以来文章之正统也”^[16]，立意与艾氏相近。所谓“有明制义”，显然着眼于唐、归文体革新后的八股成就，而非整个明代八股史。

清代制义的发展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，即出现了不少八股世家，声誉最著的有桐城方氏、宜兴储氏、金坛王氏等。其共同特点是，都赞赏、践行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创作理念，重视史传在时文写作中的作用。其中以方舟、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方氏声誉尤隆。方舟字百川，方苞之兄，虽英年早逝，未叨一第，而八股为一代大家。管世铭称，国朝“以制义而直接八大家之统者，方百川是也”^[17]。其文学《史记》、欧阳修而得其神髓。方

苞时文师从乃兄，亦从八家人，且提出了作为桐城古文理论基础的“义法”说。在他看来，古文根源于六经、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“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，莫如《左传》《史记》”，“学者能切究于此，而以求《左》《史》《公》《谷》《语》《策》之义法，则触类而通，用为制举之文，敷陈论、策，绰有余裕矣”。可见，“义法”说主要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中提炼出来的，不但适用于古文，也适用于时文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作为“古文正宗”，“皆自成一统”^[18]，自然也是习八股者的揣摩对象，具有经典意义。其中，方苞最推崇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著有《左传义法举要》，还评点过《史记》。两书是方氏构建其“义法”说的主要依据，首次对“以古文为时文”作了系统而富有理论深度的阐发，对桐城派文学理论和古文、时文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此后刘大櫆、姚鼐、梅曾亮、姚莹等桐城派古文家，大多也是八股名家，继承和发展了“义法”说，强调研读史传，有力推进了古文与时文从冲突走向融合。这种融合，因符合文体发展、创新的需要，成为清代中后期文坛的普遍选择。

宜兴储氏、金坛王氏皆为康熙、雍正年间的科举望族，储氏之储欣、储在文、储大文，王氏之王汝骧、王步青、王澍等，先后蝉联巍科，举世称羨。储欣曾为其从孙储在文八股集作序，称“礼执之学，深探六经”，“复熟《史》《汉》，吟绎韩、欧、苏氏之书”，预言“是子必亢吾宗”^[19]。在文为诸生时，因精读《汉书》而时艺骤进。同窗王步青讶异不已，叩之所以，在文俱以实告。王氏“深服其言，乃取《史记》诸传赞听夕吮咀，别走一路”^[20]，遂与储氏并成八股名家。王汝骧的代表作有《师冕见一节》题文，方苞评曰：“次第起伏照应，似欧阳氏学《史记》之文，记事体之正轨也。”^[21]类似评价，在明清文论中俯拾皆是，如艾南英赞美李龙侯制义乃“周孔之业，辅以《史》《汉》之气，得其源流而合之”^[22]，俞长城称赏万国钦时文“轻捷如史公，凝炼如班椽”^[23]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评价，既体现了时文创作学习史传的普遍风气，又体现了明清八股衡文的重要标准，即以史传经典作为参照对象。

二 根柢经史与以史解经

明清八股写作何以如此重视史学，重视汲取史传的养分？这既受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影响，又取决于八股文体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需要。在传统四部之学中，经学通过阐发圣人之道，为统治者提供理论基础，地位最尊；史学通过记载盛衰成败和前言往行，为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，是经学的历史演绎和验证，其地位虽不如经学之尊，但与经学唇齿相依，不可须臾睽离。因此，古人往往经、史并称，经史之学成为古代读书人的知识根柢，其地位远高于子学和集部之学。八股代圣贤立言，载儒家之道，其思想渊薮和所据经典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。熟读这些经典，领会所蕴精义，可保证八股内容不至于离经悖道。这是写好八股的前提条件，但远非充分条件。因为儒家义理、圣贤之道不是玄思冥想、空洞抽象的教条，而是充满实践精神、贴近社会生活的政治和道德理想，孔子所谓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^[24]。儒家之道，蕴藏于具体的人伦世事、政教盛衰、朝代兴亡之中，而记载历史演变、人物事迹的史书自然就成了道的重要载体。故要写好八股，领会、阐发圣人之道，经学之外，史学修养至关重要，若能“经学史学，烂熟胸中，然后发抒在举子业上，所以横说竖说，若决江河，莫之能御也”^[25]。否则，不但写不出优秀之作，甚至读懂名家制义都很困难，所谓“不通六经本末者，不能读也；不熟诸史得失者，不能读也；不深于周、程、张、朱之语录以得圣贤立言大义者，不能读也；不审于春秋战国之时势以得圣贤补救深心者，不能读也。”^[26]可见，尽管儒家士人历来重视经史之学，但就文体写作而言，“根柢经史”对八股的意义，远比对诗赋辞章等更重大，其要求也更直接、更迫切，正如杨文荪所论：

自有制义以来，固未有不根柢经史、通达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，若他书一切不观，惟以研求制义为专务，无惑乎亭林顾氏谓八股盛而六经微也^[27]。

八股取士制的初衷，是为了培养、选拔符合统治需

要的人才。然而,由于八股作为考试文体,与士人仕宦前途乃至家族命运紧紧捆绑,很多举子不能潜心读书,朝夕揣摩的只是如何迎合考官,以便最轻松、最快捷地搏取一第,一切与应考无直接关系的书皆束之高阁,故顾炎武感慨“八股盛而六经微,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”^[28]。其实,早在明代中期,杨慎就对此提出严厉批评:

士罕通经,徒事末节,五经子史则割取碎语,抄节碎事,章句血脉,皆失其真。有以汉人为唐人,唐事为宋事者。有以一人析为二人,二事合为一事者^[29]。

如此急功近利,导致士人空疏不学,不但经史根柢无从谈起,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具备。唐顺之、归有光等唐宋派及方苞等桐城派作家,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“以古文为时文”,正是要以根柢经史相号召,以精深的儒学义理和充实的经史内容来革除举业空疏不学、陈腐庸烂之弊。由于这一策略既呼应、激活了经史传统,又符合八股自身发展的需要,故能得到各个阶层和文派的积极响应。在此进程中,史学修养、史传经典的文章学意义,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。

当然,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思潮中对史传经典的强调,其动因不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重振经史传统、矫正空疏学风,还与八股文体的特殊性决定的论述方式、表达策略密切相关。八股从《四书》中出题,有事实题、性理题、典制题等类型。所谓“事实题”,指以《四书》中出现过的历史人物、事件为题,如王鏊《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》、唐顺之《三仕为令尹六句》、茅坤《周公成文武之德及士庶人》、归有光《宋牼将之楚一章》、韩葵《子华使于齐一章》、方苞《管仲相桓公》等。从现存八股文集看,事实题题量大,出题频率高,是明清八股文题最重要的门类之一。要写好此类文题,必须熟悉所涉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、前因后果和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、思想性格等,才能做出既不违背历史事实,又切合儒学义理的阐释或评论,否则难免妄下雌黄。故事实题写作必须“以史解经”“以史证经”。可是,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对这些历史事件、人物的记载往往仅是只言片语,材料零碎稀少,很难“以经解经”而完满自足。而《左传》

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世本》《史记》等史书保留了更为丰富的春秋、战国史料。结合这些史料展开论述,即“以史解经”,才能使论据更充分,论证更有力。

以唐顺之《一匡天下》文为例。此文旨在阐释孔子赞美管仲一匡天下的“辅世之功”,是典型的事实题^[30]。唐氏作此题的显著特点是,每每结合春秋史事立论,不做无根之谈。如起讲论时危世乱,举桓公五年(前707)周、郑繻葛之战和庄公十年(前684)蔡、楚之战两个实例,从反面衬托管仲功业之卓著。中二股正面阐述“一匡天下”,详叙僖公九年(前651)重申天子权威的葵丘之盟和僖公四年(前656)捍卫夷夏之防的召陵之战。这是管仲最为后世称道的功业,故浓墨重彩以突出其丰功伟绩。在结构上,既呼应起讲,又为后二股的议论作了铺垫。束二股用“周郑交使”“凭陵江汉”两件史事,再从反面论证管仲之功。文章最后指出,管仲虽私德不修,但与王室衰微、蛮夷猾夏等天下乱局相比,简直微不足道。行文至此,题旨已得到充分论证,故以“子贡何议其未仁耶”^[31]收结,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,充分体现了唐顺之八股“深透于史事”^[32]的特点,诚如方苞所评:“洞悉三传,二百四十年时势了然于心,故能言之简当如此。”^[33]在八股史上,归有光、陈际泰、黄淳耀、李来泰、方苞、储大文、吴鸿、管世铭等都继承、发展了这一创作范式,其影响经久不衰。

八股中的性理题,又称理学题,指直接阐发儒家天理性命、道德伦常的文题,如唐顺之《君子喻于义一节》、陈际泰《其行己也恭》、王庭《学而时习之》、邹德溥《修身则道立》、方苞《天人一理》等。与事实题相较,这些文题更具理论性质和思辨色彩。尽管如此,仍有许多作家用“以史解经”法,借助史实阐发性理。原因在于,儒学作为一种充满实践精神的学说,较为排斥玄思冥想、浮谈无稽。天理性命,须在历史盛衰、人事兴替中得到验证,所谓“名理俱在六经,而行实载诸列史,苟能广搜博览,考古知今,则事变纠纷,自能洞观其要”^[34]。如管世铭《见不善一节》文,题目出自《论语·季氏第十六》:“孔子曰:见善如不及,见不善如探汤,吾见其人矣,吾闻其语矣。隐

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^[35]管文紧扣“见不善”三字，阐发善善恶恶的君子立场和道德原则，不仅结合春秋史实立论，中二股还大胆突破科场文体不用秦汉以后事的功令，征引《史记·贾谊列传》《汉书·佞幸传》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《新唐书·奸臣列传》《宋史·奸臣列传》等，以贾谊、周党守道固穷，嫉恶如仇，虽终老不用而名彪青史的事例，与石显、李林甫、秦桧权倾朝野，却作恶多端、遗臭万年的行径作对比，从正、反两方面阐发题旨，为清代性理题佳作。而作者不惜违反功令，大量用秦汉以后史事，正说明了融贯史传、以史解经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故八股批评史上，不乏为此辩护者。如袁守定认为，圣贤之理，贯彻天地，“立于千万世上，而千百世下，若合符节”，故不妨以后世史事来阐释、验证，只要浑融自然，“征理而事自合，抒题而史已该”^[36]，不必胶柱鼓瑟，墨守功令。

八股中的典制题，如杨起元《八佾舞于庭》、王梧凤《趋进翼如也宾退》、江永《缁衣羔裘》、陈锡嘏《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》等，主要内容是考证辨析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所涉礼乐制度、典章名物等，又称经制题、典实题，本为事实题中的一小类。到了清代，随着考据学鼎盛，兴起“以考据为八股”之风，遂蔚为一大门类，故又称考据题。清人即使考证一个小问题，也要旁征博引各种文献，庶几竭泽而渔。其中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为考据的史料渊薮，也是此类文题“以史解经”的主要倚仗，“经史不熟，遇此等题，硬捺生粘不上”^[37]。如《论语·乡党》叙宾礼，有“趋进”一节，历来误解为入门之时。曾秉文作《趋进》题文，历引《左传》所载五事，即成公三年（前588）齐侯朝于晋，将授玉，卻克趋进事；襄公七年（前566）卫孙文子聘鲁，叔孙穆子相而趋进事；襄公九年（前564）盟于戏，郑公子骅趋进事；昭公十二年（前530），晋侯以齐侯宴，投壶，公孙僂趋进事；定公八年（前502）晋师盟卫侯于鄆泽，将歃，王孙贾趋进事，证明趋进“当在中庭相礼之时”^[38]，一时师友，叹其博洽。又，典制题《迁于负夏》，语出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”^[39]关

于“负夏”，朱熹仅注“地名也”，过于简略，无法据此敷衍成文。赵佑作此题，驱遣《尚书》《竹书纪年》，尤其是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所载及司马贞索引、张守节正义等史料，发明经义，补传注之不足，是清代典制题的代表作，梁章钜称之“亦是空前绝后之文也”^[40]。可以看出，史学修养对典制题同样至关重要，以致有“以《左》《史》润《周礼》，经制题第一秘诀”^[41]的经验之谈。

三 史传的文章艺术与八股创作

当然，史传对明清八股的意义，远不止提供内容、义理上的支撑和映证，更有文章艺术上的借鉴和滋养。两者的有机结合，才促成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经典在八股写作中的重要地位。而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思潮，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历史机缘。不妨以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史传选本和评点来分析这个问题。清高塘曾编选、评点《史汉合钞》。其中《史记钞》四卷，录文77篇，以本纪、列传和赞为主。卷首《史记钞杂说》曰：“兹钞为时文蓄根底，制艺溯渊源，乃录文非录史也。故以叙次工绘，议论宏阔，有篇法结构，可为文家取资者方入钞，余则姑从割爱。”明确宣示此书编纂宗旨，是文章学而非史学，意在为时文追根溯源并提供写作借鉴：

是钞本为论文计。尝见储越渔《史记序》云：“其科段关锁，合离断续，草蛇灰线，宛转关生，可以定时文之结构也。其叙次剪裁，明肃简整，行若游龙，止如勒马，可以长时文之笔力也。其写照传神，须眉欲活，抑扬唱叹，余味曲包，可以增时文之声色态度也。”数语最得读《史记》法，每心爱之，兹录入，并以语凡读古文者，皆依此法，亦不独《史记》为然。^[42]

“储越渔”即储掌文，清八股名家。其《史记序》原文今不存，所引片段，从结构布局、笔力、风神等方面，谈其借鉴《史记》写作八股的感受。高塘对此极表赞赏，认为储氏所论，不仅是时文写作圭臬，也是读《史记》、读古文的不二法门。从《史记钞》评点看，关于结构章法的内容最为丰富。高

塘对所录每篇文章，一一划分段落层次，揭示文章结构，发掘关键线索，从而使读者在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中，理清作者思路，把握局部和整体的关系。如评《项羽本纪》，根据人物关系和事件进展，将全文分为十四截：

第一截，表其世系，志略也。头角初露，便已神采焕发，盖世之气，俱见一斑。羽是篇主，梁本附传，而初时皆以梁用羽，故一路夹写，然所主自见。^[43]

第十二截，正叙楚汉交战事，以“久相持未决”标出眼目，且作停顿之势。^[44]

第十四截，结项羽之案，并藉以回映篇首，收拾通局也。^[45]

引文中志略、篇主、附传、正叙、眼目、停顿、回映、收拾等词语，都是揭窠章法结构及其表现效果的常用语。此外，还有提、伏、收、束、串渡、插入、过接、宾主、虚实、正反等，可见评点家文本揣摩功夫之深细。这种深细，也体现在《左传》评点中。如王源《左传练要·左传评》卷三《晋人败狄于箕》评：“史传文字，全要彼此互见。法则取其相间，义则取其相形。参错互交，而至文生焉。此文本传郤缺，乃夹入先轸，遂有无限波澜情趣。然使脉络不贯，又无文矣。唯以‘逞志于君’四字伏于前，而追叙郤缺一役，句句与之映。于是气势始相联络，深奇超忽，孰窥其微。”^[46]其中互见、相间、相形、参错、波澜、脉络、追叙等，也都与章法结构相关，凸显出评点家对此类问题格外重视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稍翻明清制义文稿，就会发现，此类批语和评点形式，无一不是借鉴时文评点。移用于古文，尤其是先秦两汉文，难免以今律古，穿凿附会。尽管如此，不能一笔抹杀此类评点盛行的合理性。先秦两汉文虽高古浑融，不落斧凿痕迹，更未刻意标榜法度，但都是精心结撰之作，蕴含着起承转合、主次虚实等章法结构的普遍规律。八股破题、承题、入题、出题、起讲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收结等复杂体制，正是把章法推衍到极致而集大成的产物，先秦两汉史传文则为其重要理论资源。故方苞多次强调其“义法”理论，提炼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。刘开则明确宣扬“文之义法，

至《史》《汉》而已备”^[47]。评点家对史传章法细致绵密的剖析，旨在指导古文和时文写作，为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提供有效借鉴。只要知其法而不拘泥于法，确实能开拓文境，活跃文思。如马世俊《不违农时二节》文，“前半实者虚之，既无头重之病，中间攒簇一片，无限堆垛，都化烟云”，行文简洁而空灵，无堆垛板滞之弊。方苞认为，此化实为虚之法，化用了《左传》叙鄢陵之战的构思。时楚压晋军而陈，“下既叙范匄、郤至语，却借楚子望中点出晋军布置，极虚实互见之巧”^[48]。马文善用此法，故而出色。又，董其昌有“九字诀”专论八股章法，其二为“转”，认为文章之妙全在转处，若顺题敷衍，落笔便意竭势穷。《史记》正是此道高手：“荆轲传”方叙荆轲刺秦王，至始皇环柱而走，所谓言尽语竭，忽用三个字转云‘而秦法’。自此三字以下，又生出多少烟波。制义如成、弘间大家，元气浑灏，势取直捷，转处无形。至文恪公《齐景公二节》文，则珠走盘而不出于盘，圣于此法矣。”^[49]在董氏看来，八股写作自觉借鉴《史记》翻转法而炉火纯青者，从明中期王鏊始，后被举子奉为科场秘诀。

吸收史传语体，融散入骈，化偶为奇，是八股借鉴史传笔法的又一重要表现。明成化以后，八股体制结构逐渐成熟定型。其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，每股各有两段比偶相对的文字，句式长短、行文简繁乃至声调高低等，都要相对成文。这种结构，一旦成为严格程式，最大弊端就是束缚了表达的自由，使作者在论述问题时，必须顾及形式的整齐对称，难以深入完整地阐发思想。以古文为时文，以单行散体句式打破比偶束缚，挽救八股之弊，遂成一时风尚。《史记》作为散体古文之高峰，自然成为取资渊薮。归有光作八股，在大致保持结构、文意比偶的前提下，每以散句行文，故其文纵横恣肆，疏宕流畅，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，无施不宜，一扫八股僵化、板滞之弊。其难能可贵处在于，在追求表达自由和遵守文体规范方面，保持了微妙的平衡，既能摆脱束缚驰骋自如，又不至于天马行空解散文体，诚如俞长城所论：“跌宕磅礴，纯乎古大家，读之只似散行一段，细玩乃见其股法之变，后来惟金正希深得其妙。”^[50]运古文精神气

脉于功令程式中而使人不觉,这种文体革新的才华和成就,在八股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周以清曾把他和王鏊相比较,认为“守溪善用偶,震川善用奇,临川而后,守溪时文开山也,震川时文中兴也”,赞美归有光以奇济偶,力挽颓风,中兴八股之功。其功之成,是归氏沉潜《史记》,“运《史记》、欧、曾之义法而与题节相会”^[51]的结果。又,万国钦也是以古文为时文的名家,其《舜其大孝也与 全章》文,采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笔意,直将题目作本传,而义理精要,笔力雄健。全篇不见分股,不用比偶,纯运以散体,议论风发,结构紧凑,收放自如,“其剥落呼吸,掉折渡落处,时文中史迁也”^[52],甚至连结构、内容的大致比偶也不曾措意,比归有光走得更为彻底。

除了语言形式和结构层面,史传对八股的沾溉,还表现在风神意态、风格气度等方面,其中以《史记》最有代表性。司马迁以天纵奇才,遭遇横祸,借超迈驰骋之笔,抒磊落郁塞之怀,每有雅健雄深、跌宕抑扬、一唱三叹之致。这种文风,深刻影响着明清八股创作。如赵南星《齐景公有马千驷 二节》文,借史事针砭时弊,抒发其蒿目时艰、悲天悯人之怀。俞长城评:“韩学《史记》,得其雄烈;欧学《史记》,得其缥缈。将《张中丞传后叙》及《五代史》梁、晋诸帝本纪合看,乃见此文境界。”^[53]韩、欧同学《史记》而自成风貌,一雄烈,一缥缈。赵南星兼学韩、欧而别开生面,在八股史上独树一帜。又,方舟有同题文,其后比借讥刺齐景公之丰饶豪奢表达对人生命运、穷达出处的深邃思考,格调沉郁,意境苍凉,神似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。韩葵誉之“悲喜无端,俯仰自失,真善学《史记》之文者也”^[54]。又,袁守定《时文蠡测》倡言“文章以洁为老境”。所谓“洁”,即“繁华刊落,特挺清标,枝叶扫除,独留本干”。《史记》以文风之洁彪炳千秋,“学者于此求之,可以悟斯道之极轨矣”^[55]。艾南英认为,近代推举司马迁者,虽百千言而未得要领,惟柳宗元以“洁”标之,最为精辟。在艾氏看来,太史公文“驰骤跌宕,呜咽悲慨,倏忽变化,皆洁而后至者也”,故当“以是绳今之为古文者,而因并以是绳今之为时文者”。韩、柳、欧、苏作古文,唐顺之、茅坤、

瞿景淳、归有光作时文,皆善学《史记》,其“卓然能立言于后世,未有不由于洁者也”^[56]。《史记》之文千汇万状,未必能以一“洁”字尽之。然古人于此再三致意,足见对文章艺术影响之深。

此外,八股写作经常要代圣贤立言,或模拟文中所涉人物口气敷衍其文,此即古已有之的“代言体”。这种写法,首先要考察对儒家经典精神的透彻领会;其次,要对所代表人物的身份、地位、性格、心理等有细致入微的理解和把握,要有洞察人心、体贴人情的敏锐性以及活跃充沛的想象力、虚构力,方能模拟逼真,正如茅坤所谓“作文须设以身处其地,目击其事,体贴一段精神出来;如告君父须写出忠割意思,如论事势须写出利害意思,如论小人须写出巧媚隐伏意思,论君子须写出平易坦实意思。人能模写得出,即为好文矣”^[57]。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主于言理,描摹世态人情的内容较少,可供借鉴的资源有限,而史传正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因为史书详载世间万象,人情百态,“后世情伪之变,无所不有”,“读史乃练达人情之学”^[58]。惟有人情练达,代言方能体贴真切,惟妙惟肖。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早期史著,具有“代言体”写作的丰富经验。史家所载人物事迹、心理活动、声情意态,如《左传》载介之推归隐前的母子对话,《史记》载李斯见厕鼠、仓鼠之别而引发的人生感慨等,皆生无可稽,死无对证,未必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,而是根据人性、人心,根据生活的可能性想象、虚构出来的。这种虚构方法,对于精研史传的明清八股作家来说,自是驾轻就熟。如耿争光《又称贷而益之》文,描摹债主临门、喧哗叫嚣、逼迫勒索百姓之状,赵南星《胁肩谄笑 二句》文,代曾子立言,刻画趋炎附势者种种可笑、可耻、可怜之态,皆无中生有,妙入毫颠,深得史家“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”^[59]之精髓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明清文论家一方面津津乐道于史传辞章与八股文法的关系,一方面又再三强调,先秦两汉文高古朴茂,自然浑成,“皆无意为文而极天下之文之盛”^[60];作者操觚,“行乎所不得不行,止乎所不得不止”^[61],并无一套成法横亘胸中。故韩柳之前,无以文法教人者。韩柳出,始有文章指南。尤其是宋代以后,随着科举兴盛,

文法研讨日趋细密。然宋代科举,最重要的文体是经义、策论,表达方式以议论为主,故在《古文关键》《古文轨范》等指导举业的著名选本中,都没有录主于纪人叙事的史传文,即使录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,也仅是节录其中的辞命、章表奏疏、论赞等可资议论的文体和内容。以纪人叙事为主的史传文文法探讨蔚为风气,一直要到明中期唐顺之、归有光等大煽“以古文为时文”风气之后,至清代方苞等高倡“义法说”而达到顶峰。这种探讨,乃以后世文章学观念,尤其是八股视角反观先秦两汉史传,揭橥、提炼出诸多文章义法,然后,又以这种义法指导时文写作。“以古文为时文”思潮的发展进程,实际上也是史传辞章艺术与八股文法互相发现、互相生成、互相印证的过程。正因如此,归、方等八股名家的时文,多具古文格调气息,而其古文又往往打上时文烙印。清人讥方苞“以古文为时文,却以时文为古文”^[62],并非空穴来风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明清史传文法探讨纯是以今范古,毫无价值。袁枚指出,“古圣人以文明道,而不讳修词”^[63]。既“不讳修词”,必然伴随着对文章艺术规律、表达效果的追求和探讨,只是古人没有明确揭示出来,而是蕴含在写作过程中,所谓“文成而法立者”^[64]。明清士人以先秦两汉史传为古文典范,挖掘、归纳出原本蕴而未明的辞章艺术规律,并运用于八股写作,对于提高文品,活跃文思,丰富八股的艺术表现力,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综上所述,明清时期,随着“以古文为时文”蔚然成风和叙事文在古文谱系中地位骤升,史传大量进入文章总集,与八股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一方面,八股阐发儒学义理的体制规定和儒学注重实践、与史学互为支撑的品格,使“根柢经史”不仅着眼于一般意义上重振经史传统、矫正空疏学风的需要,更是为了满足八股在阐释策略上“以史解经”的特殊要求。另一方面,八股在体制成熟、定型之后,日趋陈腐,生机萎萎。以古文为时文,借鉴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传文在章法结构、散体表达、虚构艺术、风格塑造等方面的成就,济制义之穷,为八股续命,成为时代的共同选择。就总体言,这场从明中叶开始直至清中叶,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文体革新,为八股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

新的路径和空间,较好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。在此过程中,史传文越来越多地进入文章选本和评点家视野,不断辞章化和文学经典化,其文章学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挖掘、阐释和张扬。

[本文系中山大学文科重要成果专项培育项目“历代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”(项目编号11100-18843403)的阶段性研究成果]

[1] 参见何诗海、陈露《史传入集的文章学考察》,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20年第4期。

[2] 新时期以来,“以古文为时文”已成八股研究的热点,黄强、孔庆茂等学者在其论著中都有专章探讨。参见黄强《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》第13章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;孔庆茂《八股文史》第3章,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。然而,古文中史传的地位及其与八股的关系,尚少关注。

[3] 方苞:《钦定四书文凡例》,《钦定四书文》卷首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51册,第3页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
[4] 贺贻孙:《水田居文集》卷三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21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496页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

[5][64] 戴名世:《戴名世集》,王树民编校,第101页,第109页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[6][16][20][26][27][38][40][54] 梁章钜:《制义丛话》卷九,陈居渊校点,第148页,第22页,第187页,第39页,第4页,第374页,第303页,第175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。

[7] 焦循《里堂家训》卷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51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530页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[8] 章学诚:《上朱大司马论文》,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612页上,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。

[9] 孙学谦:《文章二论》卷上,余祖坤《历代文话续编》中册,第813页,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10][31][32][33][51] 方苞:《钦定四书文·正嘉文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51册,第88页下,第122页上,第100页上,第122页上,第173页下、第174页上。

[11] 茅坤:《庐陵史钞》序题,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卷六一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383册,第680页下。

[12][23][50][53] 俞长城:《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

义》卷一二,第12页b,第2页a,第36页b,第25页a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三年(1738)文盛堂刻本。

[13] 章学诚:《文理》,《文史通义校注》,叶瑛校注,第286页,中华书局1994年版。

[14][22][56] 艾南英:《天佣子集》,《明别集丛刊》第5辑第39册,第135页下,第161页下,第136页上,黄山书社2016年版。

[15] 周以清《四书文源流考》引艾南英语,阮元《学海堂集》卷八,《中国历代书院志》第13册,赵所生、薛正兴主编,第139页上,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。

[17] 管世铭:《读书得三十四则》,《韞山堂文集》卷八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93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521页上。

[18] 方苞:《方苞集·集外文》卷四,刘季高点校,第61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
[19] 储欣:《在陆草堂文集》卷五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27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242页上。

[21][48] 方苞:《钦定四书文·本朝文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451册,第754页上,第839页上。

[24]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一三〇,第10册,第4003页,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。

[25][37][41] 孙维祺《明文得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经部第10册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312页上,第165页上,第299页上,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。

[28] 顾炎武著、黄汝成集释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一六,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本,第936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29] 阮葵生:《茶余客话》卷十六,李保民点校,第376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。

[30] 关于唐顺之《一匡天下》的解读,参考了刘尊举《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创作形态及文学史意义》(《文学评论》2012年第5期)一文,特此致谢。

[34]《古今图书集成·理学汇编·文学典》卷一八〇《经义部总论》引凌义渠《正文体疏》,陈梦雷编、蒋廷锡校,第64册,第77584页中,中华书局、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版。

[35] 何晏集解、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一六,《十三经注疏》下册,阮元等校刻,第2522页中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[36][55] 袁守定:《时文蠡测》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陆

辑第12册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568页下,第570页上,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。

[39] 赵岐注、孙奭疏:《孟子注疏》卷八上,《十三经注疏》下册,阮元等校刻,第2725页中。

[42][43][44][45] 高塘:《史汉合钞·史记钞》卷首,《史记研究文献辑刊》第5册,吴平等编,第485页下,第490页,第500页上,第502页上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46] 王源:《左传练要·左传评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经部第139册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224页上。

[47] 刘开:《刘孟塗集·文集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10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350页下。

[49] 袁黄:《游艺塾续文规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18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239页下、第240页上。

[52] 万国钦《舜其大孝也与 全章》艾南英评语,《明文钞五编》,高塘编,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》第29册,第612页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。

[57]《古今图书集成·理学汇编·文学典》卷一八〇《经义部总论》引茅坤《论文》,陈梦雷编、蒋廷锡校,第64册,第77576页上。

[58] 周永年:《先正读书诀》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陆辑12册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302页下。

[59] 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第1册,第166页,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[60] 王引之: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三,罗振玉辑《高邮王氏遗书》本,第200页上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。

[61] 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八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2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编纂委员会编,第83页上。

[62] 钱大昕: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三,《嘉定钱大昕全集(增订本)》第9册,陈文和主编,第546页,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63] 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一一,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第3册,周本淳点校,第1398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
[作者单位:中山大学中文系]

责任编辑:赵培